

东南亚史研究中的“曼陀罗”范式

吕振纲

摘要：在西方的东南亚史研究中存在着一条鲜明的“曼陀罗”理论范式。这一理论的发展经过了三个典型的发展阶段：早期在东南亚王权及宗教研究的影响下，逐渐反对“印度化”理论以及倡导东南亚史研究的“本土视角”，为曼陀罗理论的提出奠定基础；在第二阶段，随着“银河政治”“尼加拉”及“分段国家”等类似概念的提出，这一史学范式迎来概念化竞争，新概念在反对、修正或补充曼陀罗概念的同时，又推动了这一范式的繁荣；在第三阶段，曼陀罗史学继续在理论和应用两方面深入发展，西方的东南亚史研究由此取得长足进步。相对而言，中国的东南亚史研究尽管发展迅速，但囿于过度依赖中文文献以及东南亚本土文献资料的匮乏，研究方向和内容上都有一定的不足，需要从加强多语种的文献翻译、史学理论整合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曼陀罗；星系政体；尼加拉；分段国家；太阳系政体

收稿日期：2022-03-31

作者简介：吕振纲（1989—），暨南大学政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东南亚国际关系史。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东南亚曼陀罗国际体系的生成与变迁研究”（项目编号：19CGJ01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学术史视野下的古代东亚朝贡体系研究：回顾、争论与发展”（项目编号：2021M691255）的阶段性成果。

20世纪60年代，杰出的东南亚历史学家沃尔特斯（O. W. Wolters）创造性地运用“曼陀罗”概念探讨东南亚区域内部关系史。经过50多年的发展，“曼陀罗”这一史学范式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概念的介绍及其相关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可谓寥寥。^① 本文尝试以历史发展为主线，全面回顾曼陀罗的

^① 国内采用“曼陀罗”这一术语进行东南亚历史及相关研究的主要有：吕振纲：《朝贡体系、曼陀罗体系与殖民体系的碰撞》，《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5期；吕振纲：《曼陀罗体系的兴衰：以1293—1527年的满者伯夷王国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17年第6期；吕振纲：《曼陀罗体系：古代东南亚的地区秩序研究》，《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8期；龙晓燕：《勐、曼陀罗与大一统中国：滇西耿马土司的“国家化”研究》，《思想战线》，2018年第5期；王琛：《“曼陀罗思想”对印尼外交政策的影响：战略文化的视角》，《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1期。

概念及其在东南亚史研究中的运用,综合比较分析“曼陀罗”(mandala)、“尼加拉”(negara)、“星系政体”(galactic polity)、“太阳系政体”(solar polity)、“分段国家”(segmentary state)等史学概念的异同,最后结合中国东南亚史的研究现状,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东南亚史研究提出建议。

一、准备阶段：东南亚史研究的前曼陀罗阶段

在东南亚史发展早期,赛代斯的“印度化”理论是早期国家理论发展的重要假说。该理论强调印度文明对东南亚历史发展的影响。赛代斯认为,东南亚系统地吸收了印度的王权观念,包括对婆罗门教和佛教的崇拜、《往世书》里的神话和遵守《摩奴法典》等方面,并且采用梵文作为表达工具,^①从而打上了深刻的印度文化烙印。这一印度化过程先后经历两个阶段,建立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印度化王国,其时间跨度从1世纪开始的扶南王国到16世纪初期马来世界的印度化王国的衰落。在这漫长的跨越千年的历史中,东南亚的历史发展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看,东南亚也可以被称为“远印度”或“大印度”。^②

在印度化理论的影响下,印度式的王权理论以及印度化王朝的国家历史成为当时的研究热点。海因·盖尔登(Heine-Geldern)被视为东南亚宗教与王权政治研究的奠基人。在他的《东南亚的国家与王权概念》一文中,盖尔登强调东南亚存在的宏观宇宙与微观宇宙的和谐与平行关系,两者的和谐关系是通过将前者组织为后者的形象,作为一个较小规模的宇宙来实现的。^③印度教佛教神话中的梅鲁山、四大洲、七大洋、乳海、三十三重天等形象深刻影响了东南亚各王国的早期建设。这种宇宙的图式被东南亚各国所接受,东南亚所有的地区大国都把自己想象成宇宙的中心,统治者将某座山神圣化,在山顶建立起庞大的寺庙,作为宇宙的中心须弥山,他们相信山上有因陀罗居住的天界,而山下就是被神庇护的王国。宗教与王权关系的研究已经揭示了曼陀罗史学范式的部分核心要素,即对宇宙观念、宗教文化以及王权表达等方面的重视。在成熟的曼陀罗史学研究中,诸如此类的概念得到更为系统的研究。

虽然印度化学说主导了二战前后的东南亚史研究,但并非没有反对者。早在二战前,荷兰学者范·勒尔(Van Leur)就质疑过赛代斯的印度化的观点。他认为几个世纪缓慢的印度化进程并没有给印尼政治秩序的任何部分带来任何根本变化,“世

① 赛代斯著,蔡华、杨保筠译:《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4—35页。

② 相关表达及研究参见:H. G. Quaritch Wales, *The Making of Greater India: A Study in Southeast Asian Culture Change*, London: Bernard Quaritch, 1951; Kwa Chong-Guan, *Early Southeast Asia viewed from India: An Anthology of Articles from the Journal of the Greater India Society*, New Delhi: Manohar Publishers, 2013.

③ Robert Heine-Geldern, “Conceptions of State and Kingship in Southeast Asia”,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2, No.1, 1942, p.15.

界宗教和外国文化形式的光泽是薄薄的，剥落的釉；在它下面，整个古老的土著形式继续存在”。^① 由于范·勒尔的著作是由荷兰文写成的，在当时的英文学术界影响力极小。直到1955年，他的著作被首次翻译成英文后，他的学术观点才得到广泛传播。

二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些学者虽然继续从印度化理论中汲取营养，但已经与他们的先辈拉开了距离。他们认为，赛代斯似乎过分夸大了印度文化的影响，对东南亚的本土视角关注较少，东南亚并不是印度文明的复制品。他们将从外来者那里获得的文明要素进一步改造和挪用，使它们适应本土的价值观和制度，推动了印度文化的本土化。一大批东南亚史学者，如霍尔、约翰·卡迪、夸利奇·威尔士、沃尔特斯等人也都主张承认并发掘东南亚本地人在印度化进程中的卓越贡献。夸利奇·威尔士提出“本地天才”（local genius）的观点，强调东南亚本土精英在吸收、引进和改造印度文化中的积极作用。^②

对东南亚王权政治的研究以及印度化理论的质疑促使更多的学者转而采用东南亚的本土术语描述东南亚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东南亚一些经典铭文的出土以及对东南亚传统文献的挖掘，曼陀罗作为描述东南亚本土政治与社会关系的术语被有效地挖掘出来。然而，略显尴尬的是，尽管人们认为曼陀罗这一术语是东南亚本土的，但其实这一术语仍是印度文化的舶来品。当然，我们对此仍无需太过介意，东南亚的历史有自己的独特轨迹，并不是印度或中国历史的附庸。从这一观点出发，从曼陀罗的视角理解东南亚的历史变迁仍然是恰当的。

二、“曼陀罗”诸概念的提出

在这一术语引入东南亚史之前，“曼陀罗”已经作为一个宗教或艺术词汇用于印度教、佛教文化的研究中，后来又被用于心理学的研究中，杰出的心理学家荣格就借用这一概念来完善他的心理学说。^③ 在宗教意义上，曼陀罗被视为一种宇宙图式，是佛教和印度教象征化的神圣空间。在深受上座部佛教以及藏传佛教影响的地区，西藏的唐卡及以东南亚的建筑、壁画和美术等领域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曼陀罗艺术。曼陀罗象征着一个神圣的空间，有时被理解为一个为了某种仪式或实践的表演，或者为了教士或神秘主义者的使用而创造的地方。^④ 在佛陀的时代，曼陀罗从实际的固定地方中解放出来，被用以描绘理想的住所，其中佛教的践行者和它的精神可以形而上学地共存。^⑤ 然而在宗教意味上，曼陀罗存在一个悖论，虽然它是以一种中心的、

① Van leur, *Indonesian Trade and Society*, Hague: W. Van Hoeve Publishers Ltd, 1967, p.95.

② H. G. Quaritch Wales, *In Search of Greater India*, Canberra: David Russell Lawrence, 2019, pp.47-74.

③ 参见：C. G. Jung, *Mandala Symbo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④ Deise Leidy and Robert Thurman, *Mandala: The Architecture of Enlightenment*, Boston: Shambhala, 1998, p.17.

⑤ Susan M. Walcott, “Mapping from a Different Direction: Mandala as Sacred Spatial Visualization”, *Journal of Cultural Geography*, Vol.23, No.2, 2006, p.81.

对称的和定向的模式构建的，但它在印度教 - 佛教形式中，却试图传递世界虚空的观点——“现实为空，没有本质，没有稳定的核心”。^①

随后，曼陀罗被应用于政治和社会领域，用以描述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区域内部的组织结构。最早在东南亚史学界使用这一概念的学者可能是沃尔特斯。1968年，在一篇论文中，沃尔特斯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在明代中国与日本进行朝鲜战争期间，暹罗政府主动请求帮助中国并设想在海上攻击日本这一事件。^②他援引印度的拉惹曼陀罗（*raja-mandala*）理论，并指出这一观念影响了暹罗的外交决策和行为。在20世纪70年代，沃尔特斯发表了一系列历史论文，继续运用曼陀罗的概念探讨东南亚古代帝国的王权及对外关系。^③总的来说，这一理论并不完整，尚未形成独立的分析框架。直至1982年，沃尔特斯的《东南亚视野下的历史、文化与区域》^④一书才被视为构建曼陀罗史学理论的经典之作。

沃尔特斯构建曼陀罗理论的尝试长达15年左右，赢得了东南亚史学界的重视。然而，从曼陀罗这一史学概念的提出到被普遍接受这一时段，一些类似的史学概念也被相继提出，这些概念与曼陀罗的概念相似，并为曼陀罗范式的完善提供了必要条件。为更好澄清概念间的差异，本文按照时间顺序来简单介绍这些概念。

（一）分段国家

源于非洲研究的“分段国家”概念比较早地被引入东南亚史的研究当中。早在1953年，艾丹·索夏尔（Aidan Southall）在《阿鲁社会》一书中最早阐释了这一概念。她区分了两种国家形态，分别是单一国家和分段国家。她认为，单一国家是一种政治制度，其中有一个垄断一切的中央政府，它拥有专门的行政人员，在规定的领土范围内合法地垄断暴力。这种定义类似于韦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定义。^⑤而分段国家的权力结构是不同的，其主要特征如下：

1. 领土主权得到有限的和相对的承认。政治权威在政治中心附近最为强大，并且向外围越来越稀释，常常遮蔽为一种仪式霸权。
2. 有一个中央集权政府，但也有许多外围的行政中心，中心只行使有限的控制。
3. 中心有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但外围的行政中心在管理规模上要比中心地区更小一些。
4. 中央权威成功地在有限的领域和有限的范围内声称垄断使用武力，但是边缘中心也拥有有限的合法力量。
5. 权

^① Martin Brauen, *The Mandala: Sacred Circle in Tibetan Buddhism*, Boston: Shambhala, 1997, p.15.

^② O. W. Wolters, “Ayudhyā and the Rearward Part of the World”,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100, No.2, 1968, pp.166-178.

^③ 沃尔特斯对吴哥王朝的历史解读就体现了这一努力，参见：O. W. Wolters, Jayavarman II’s military power: “the Territorial Foundation of the Angkor Empir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73, Vol.105, No.1, pp.21-30.

^④ O. W. Wolters, *History, Culture, and Region in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⑤ Aidan Southall, *Alur Society: A Study in Processes and Types of Domination*, LIT Verlag, 2004, pp.277-278.

力的次要中心有几个层次。相对于中央权威，它们以金字塔形式组织起来。相似的权力在每个级别上都重复出现，但范围逐渐减小。边缘权威是中央权威的缩影。6. 次级权威越多，就越有可能将其效忠从一个权力金字塔改为另一个权力金字塔。因此，分段状态是灵活和波动的，在几个相邻的权力金字塔中具有政治地位的外围单元因此变得相互连锁。^①

索夏尔的定义强调了中央权威的有限性以及中心与外围的权威分散，这种分段政治模式已经应用于分析东南亚以外的许多不同复杂程度的社会，这种形式的国家社会是一种权力下放的社会。继索夏尔之后，伯顿·斯坦（Burton Stein）进一步发展了分段国家的概念。他在对分段国家的描述中增加了一些额外要点。他强调，一个分段国家的主权是双重的。分段国家往往在中心拥有政治主权和仪式主权，但在边远地区，随着其政治控制能力的减弱，中心对边缘的主权退化到仪式霸权或仪式性的统治权。^②1980年，他运用分段国家的概念探讨了中世纪南印度的国家与社会形态，先是将分段国家理论应用于印度南部的朱罗王国，随后进一步扩展到了维贾亚纳加拉王国的分析。^③分段国家理论也成为研究印度国家历史形成最重要但也最具争议的理论。索夏尔本人也对伯顿·斯坦将分段国家理论引入南亚文化领域赞赏有加，认为这样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很有新意。^④

索夏尔有关分段国家的研究是以非洲地区为研究对象，伯顿·斯坦的研究则进一步拓宽了该理论的应用范围。1972年，托马斯·基佛（Thomas Kiefer）使用“分段国家”来描述菲律宾南部的苏禄政权。^⑤1990年，泰国史学家苏奈特·素廷塔拉诺（Sunait Chutintaranond）将分段国家理论运用于分析阿瑜陀耶时期的泰国，证明了这一概念对泰国历史的适用性。^⑥直到最近，法国学者安德鲁·哈迪（Andrew Hardy）还把古代占婆也看作分段国家，认为占婆分段国家内部存在一个政治一体化机制。^⑦

① Aidan Southhall, *Alur Society: A Study in Processes and Types of Domination*, LIT Verlag, 2004, p.248-249.

② Burton Stein, "Ritual Sovereignty and Ritual Policy: Some Historiographic Reflections", eds in, *State, Power, and Violence*, Harrassowitz: Wiesbaden, 2010, pp.603-626.

③ Burton Stein, *Peasant state and society in medieval South Ind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Burton Stein,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Vijayanagar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④ Aidan Southhall, "The Segmentary State in Africa and Asi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30, No. 1, 1988, pp. 52-82.

⑤ Thomas Kiefer, "The Tausug Polity and the Sultanate of Sulu: A Segmentary State in the Southern Philippines", in Thomas Kiefer eds., *People of the Current: Sulu Studies Revisited*, Manila: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Culture and the Arts, 2001, pp. 1-38.

⑥ Sunait Chutintaranond, "Mandala", 'Segmentary State' and Politics of Centralization In Medieval Ayudhya",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Vol.78, Iss.1, 1990, pp.89-100.

⑦ Andrew Hardy, "Champa, Integrating Kingdom: Mechanisms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in a Southeast Asian Segmentary State", in *Champa: Territories and Networks of a Southeast Asian Kingdom*, Paris: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2019, p.221-252.

（二）银河政治

斯坦利·坦比亚（Stanley Tambiah）对东南亚区域史内部关系的研究也是从泰国开始的。1976年，他发表的《世界征服者与世界退却者》一书，将曼陀罗运用到泰国史的研究中。他认为，前现代东南亚的政治体系在各个维度上具备概念性的“总体性”，即一个相同的基本模式——曼陀罗，这一模式在东南亚的宇宙论、地形学以及政治经济特点等几个层面上反复出现。^①坦比亚建议最好使用星系政体来再现传统王国的政体形式。

沿袭盖尔登对宗教与政治关系的研究，坦比亚同样强调了宏观宇宙与微观宇宙的对应关系以及数字命理学在东南亚政治建构中的作用。坦比亚描述了几种典型的神圣王权观念。诸如王法（Rajadharma, the king's whole duty）和法王（Dharmaraja, righteous ruler）等概念对王权的作用。在佛教王国中，卡卡瓦蒂（cakravartin）比正法的观念更具吸引力，它为佛教王国的统治者树立了世界的征服者形象，成为东南亚国家王权扩张的动力。东南亚的统治者往往将自己看作印度教神话中的毗湿奴、湿婆的化身，或者是以阿育王为典范的法王或佛陀化身。而在实践中，印度的阿育王以佛法征服世界已成为一个现实可行的经典范式，鼓励东南亚的佛教王国努力成为世界的征服者。

在星系政体中，坦比亚关注的是东南亚的佛教世界。他观察到泰国的政治结构中存在一个中心以及围绕这个中心的卫星等级结构，“一个由差异化卫星国家环绕的中心行星，这些卫星或多或少是在轨道上和中心势力范围内的自治实体”。^②卫星国家越远，中心的引力就越弱。在这个国家的外围是其他与自己竞争卫星国家的中心。国家的兴衰如同曼陀罗一样，由于联盟经常发生变化，星系政体的政治也是不稳定的。坦比亚还划分了星系政体的政治结构。以暹罗的大城王朝为例，大城王朝内部曾存在五或六个等级的政治结构。^③类似的政体结构在其他东南亚国家也可以找到，但这一政治结构并不稳定。尽管存在中心的向心性特点，但由于王权继承的不明确以及派系集团的竞争，时常会发生王权继承危机，严重时甚至会颠覆原来的统治结构。

最后，坦比亚为星系政体设定了比较的参数。他认为东南亚传统政治的生命周期和发展轨迹可以看作是在某些参数范围内发生的，这些参数基本可以分为三个，分别是国家的强弱之分、国内的政治经济结构以及行政管理的内卷化程度。^④弱国政

^① Stanley Tambiah, *World Conquerer and World Renounc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102-103.

^② Ibid., p.113.

^③ 斯坦利·坦比亚著，李晓哲译：《星系政体：传统东南亚王国的结构》，郁丹等主编：《环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编译文集一：环境、生计与文化》，学苑出版社2017年版，第216—217页。

^④ Stanley Tambiah, *World Conquerer and World Renounc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124-131.

体可能是星系政体的常态，而强国政体则可能是在强力控制下形成的特殊的帝国模式，这一模式通常并不持久。在政治经济结构上，不同星系政体内部农业的集聚程度、贸易与商业的繁荣以及政府可以获得的农业税收等方面的不同将造成各国曼陀罗政体发展的差异；而星系政体内部呈现出的地方对中心行政管理机构的模仿，形成行政管理机构的二元性和复制性，这种二元性程度的不同造成管理的内卷化程度差异。尽管这些参数有时候被批评为多此一举，但坦比亚的尝试还是对以后的学者进行东南亚不同曼陀罗政体的比较研究有启示作用。

（三）尼加拉

星系政体开辟的对东南亚国家个案全景式的分析启发了以后的学者。1980年，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以爪哇岛为基础，撰写了《尼加拉》一书。尼加拉这一概念通行于马来世界。格尔茨指出，尼加拉（neagara, nagari）是一梵语借词，本意为城镇，被引申为宫殿、首都、国家、领土等多种含义，描述的是由传统城市所孕育的高等文化及集中在城市里的超凡政治权威体系组成的世界。与其相对的是德萨（desa）被用来指称乡村、村庄等含义。^① 格尔茨并没有在狭义上使用这一术语，它强调尼加拉和德萨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构成了剧场国家的全部。

在研究上，尼加拉强调国家的仪式本质。尼加拉将自己视为典范的中心。^② 典范中心并不追求霸权、帝国或者卡卡瓦蒂等宏大叙述，只满足于仪式的展示。或许是受到社会学中拟剧理论的启发，格尔茨认为尼加拉的典范中心是个舞台，从国王到下层平民都是这个舞台的过客，饰演属于自己的角色。因此，尼加拉是一个剧场国家，国王和王公们是主持人，祭司是导演，而农民则是支持表演的演员、跑龙套者和观众。王室庆典主义是王室政治的驱动力，公众仪式并不是巩固国家的权谋，而正是国家本身。权力服务于夸示（pomp），而非夸示服务于权力。^③

在结构变迁上，尼加拉被视为一种等级裂变体系。格尔茨建立了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的逐级衰落模型：在地理意义上，大大小小的国家以典范中心为榜样，学习和克隆典范中心，它们是典范中心粗糙的模仿品；在纵向上，出现“衰降型地位模式”的文化渐衰过程。^④ 随着王族世系的不断壮大，即使是典范中心的统治者也不能总是宣称拥有神性，王国从神性国家降落到人性国家。而在次级的典范中心，同样的过程也在发生。

尼加拉的典范中心内部以及不同典范中心之间的关系是脆弱和多变的，因此国家注定是一种不稳定的结构。典范国家的张力在于典范国家仪式的向心力和国家结

① 格尔茨著，赵丙祥译：《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② 同上，第13页。

③ 同上，第12页。

④ 同上，第16—17页。

构的离心力，支撑它的政治结构是脆弱的，典范领导者的雄心依赖于联盟、诡计、诈术和虚张声势。^① 格尔茨指出，巴厘高地典范中心的君主与海洋典范中心的君主彼此进行权力争夺，试图互相削弱，由于地理位置不同，高地君主可以从切断水源供应来威胁低地君主的利益，因此，争夺水利灌溉系统成为王国纷争的主要内容。

（四）曼陀罗

在分段国家、星云政体以及尼加拉等概念形成之后，沃尔特斯再次完善了他的曼陀罗理论，并于1982年出版了《东南亚视野下的历史、文化与区域》一书，推动曼陀罗史学范式走向成熟。沃尔特斯的曼陀罗研究特别强调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文化特征上强调印度文化以及本土文化的双重作用。东南亚的曼陀罗政治历史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这一点在当时的东南亚研究界已经成为共识。沃尔特斯并不否认印度宗教文化的影响，但他更加强调印度政治文化对东南亚政治体系的影响。他重视《摩奴法典》以及《政事论》这样的政治法律著作对东南亚的影响。^② 沃尔特斯也强调，印度文化的影响是通过印度因素与当地文化的结合，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印度文明的要素在东南亚逐渐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并与其原有的文化土壤分离，并最终在“本土化”的进程中彻底地丧失其原有的含义。^③ 东南亚精英对印度文化的吸收与挪用，是东南亚区域历史发展的主体。

在本土文化特征上，沃尔特斯强调并系继嗣、对门第与世系的冷漠以及对同代人中具有精神特质者的强烈关注，是早期东南亚许多地区的三个主要的文化特征，^④ 它们对东南亚曼陀罗政治的形成至关重要。并系继嗣关系和对世系的冷漠削弱了王位继承中世系或者血统的重要性。东南亚诸王国所固有的离心倾向和对王朝继承的竞争都促进了派系竞争，这也是东南亚曼陀罗诸王国政权频繁变更的重要原因。

第二，在内部政治关系上，沃尔特斯强调国家管理的曼陀罗特征。首先，曼陀罗在行政管理中必备的两项技能，一个是发展国内外的间谍网络，以获得更多的政治情报；另一种是运用外交的手腕。^⑤ 这些内容大多是遵从考底利耶（Kautilya）《政事论》（Arthashastra）的教诲。其次，统治者个人而非官僚程序对曼陀罗关系的巩固至关重要。统治者本身的权力受到限制，并且与其周边或者下面的曼陀罗中心竞争更大的权威。因此，统治者必须发展一种能力，能够调动广泛的亲属关系网络，

① 格尔茨著，赵丙祥译：《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② O·W·沃尔特斯著，赵雪峰译：《东南亚视野下的历史、文化与区域：关于东南亚历史的界定》，《南洋资料译丛》，2011年第2期，第59页。

③ 同上，第63页。

④ O·W·沃尔特斯著，程鹏译：《东南亚视野下的历史、文化与区域：文化模式的特征》，《南洋资料译丛》，2011年第1期，第49页。

⑤ O·W·沃尔特斯著，王杨红译：《东南亚视野下的历史、文化与区域：区域内部关系中的历史范式》，《南洋资料译丛》，2011年第1期，第53页。

同时平衡不同利益集团的分歧。^①沃尔特斯将那些能够吸引大众具有超凡魅力的统治者称之为“有能力的人”，他们是克里斯玛型的统治者，能够吸引追随者的关注，同时能够给予追随者适当的回报。于是在统治者与追随者之间形成了一种“赞助人-客户”（patron-client）的关系。^②

第三，在对外关系上，曼陀罗被认为是东南亚国际关系的重要特征。在东南亚国家之间，存在一个相互交往的惯例规则，这一规则也受到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影响，但与这一体系又有着很大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差别是，古代东南亚地区并没有一个类似于中国这样实力超群的大国发挥稳定器的作用。于是，大大小小的国家此起彼伏地崛起，相互交往或争战，大国的霸权转瞬即逝。小国为求生存，必须依附大国才能得到安全，这也推动了东南亚国家之间曼陀罗关系的发展。

三、争论及发展：曼陀罗史学的繁荣

（一）诸概念的比较与争论

无论是曼陀罗、星系政体，抑或分段国家、尼加拉等概念，上述概念相互补充，构成了曼陀罗理论体系的一部分。在这些概念中，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强调东南亚区域内部关系的中心-边缘模式。这一模式既存在于国家内部，也存在于国家之间。从结构上，曼陀罗政治有两大特征：存在一个权威中心和一系列较小中心的并存。^③葛西克（Gesick）也将曼陀罗描述为“大型政治单位的拼凑建筑，其中二级和三级中心保留了大量的内部自治权，以换取承认中心的精神权威”。^④曼陀罗体系由重叠的“王圈”组成，每个曼陀罗本身是由同心圆组成，描述中心-外围的关系。外圈的国家或多或少保持着独立王国的地位；虽然承认中心的地位，但避开了后者的直接政治控制。第二，强调神权与王权的紧密结合以及中心王权的有限性。任何一个东南亚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最大的同心圆包围的区域，但是只有在中心，即最小的同心圆所在的位置，国王拥有的才是真正的绝对权力。^⑤上述概念都承认神权对王权的强化作用，但这并没有改变王权的有限性。第三，都强调领土的非主权性。这种非主权性主要是指任何一个曼陀罗国家都没有固定的现代意义上的边界，他们的领土交互重叠。这种结构的共同点是松散的国家并存，没有明确的领土界限。

① O·W·沃尔特斯著，王杨红译：《东南亚视野下的历史、文化与区域：区域内部关系中的历史范式》，《南洋资料译丛》，2011年第1期，第53-54页。

② O·W·沃尔特斯著，程鹏译：《东南亚视野下的历史、文化与区域：文化模式的特征》，《南洋资料译丛》，2011年第1期，第48页。

③ Mark S. Williams, “Mandala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Magindanao Muslim Society”, *Culture Mandala: The Bulletin of the Centre for East-West Cultural and Economic Studies*, Vol.7, Iss.2, 2016, p.2.

④ Lorraine Gesick, “Introduction”, in Lorraine Gesick eds., *Centres, Symbols, and Hierarchies: Essays on the Classical States of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983, pp. 1-8.

⑤ 米尔顿·奥斯本著，郭继光译：《东南亚史》，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8页。

然而，这些相似的概念各有强调的侧重点。星系政体和曼陀罗更多强调一种区域间大国小国的曼陀罗结构，强调国家间实力差距以及共同文化基础的互动，这是一种“强物质、弱文化”意义上的互动。星系政体这一术语在泰国等佛教世界更为流行，更为强调曼陀罗中心的主导作用、中心对边缘的吸引以及对曼陀罗圈层结构的重视。维克多·利伯曼（Victor Lieberman）质疑星系政体这一概念不够精确，转而提出“太阳系政体”这一说法。在他看来，每一个王国都是太阳系政体，这个概念能够恰当地描述出省级“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而太阳的“引力”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弱^①这一趋势。

尼加拉的概念则强调了典范仪式在构建曼陀罗关系中的作用，仪式是曼陀罗互动的核心要义，国家间的实力被认为是居于次要位置。显然，这是一种“弱物质、强文化”上的互动。由于东南亚大陆的碑文很少发现使用这一术语，尼加拉被认为是描述海岛地区政治关系的词汇。分段国家的概念强调国家中存在政治权力与仪式权力的分离，这种多层次的权力划分突破了曼陀罗研究中强调单一中心权力递减的趋势。它对仪式权力的重视又与尼加拉的概念相似。然而，使用“分段”这一概念还暗示了亲属团体或“拟家族”团体在这些不断变化的政治联盟派别的组成中的重要性。非洲地区的政治单位通常比东南亚地区更小，以本地领导人为中心且在不同派别之间的联盟通常也是单一直系血统群体。在东南亚，联盟网络由更分散的个体组成，统治者必须通过双系继嗣关系、广泛的政治联姻或者虚构的亲属关系巩固分段国家。因此，在使用分段国家这一概念研究东南亚的历史与现实时，学者们也会保留一些核心的假定，弱化一些不符合东南亚实际的假定。

应当承认，从整体上看，描述东南亚本土政治的诸多概念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通过使用诸如曼陀罗、尼加拉或星系政体这样的术语来发展国家地位和国家间关系的区域概念的种种努力，都不可避免地被质疑为现代学者的杜撰。这些概念和术语主要是现代学者的发明和创造，这些术语本身并不能证明在东南亚地区有过这些政体。库尔克指出，早期的消息来源很少有证据表明这些术语是以如此全面的方式使用的，它是一种解释学上的辅助，而不是一种真实存在的东西。^②扎哈罗夫批评沃尔特斯在提到室利佛逝王国时使用“曼陀罗”一词，指出在室利佛逝的铭文中，这个王国从来没有把自己称为曼陀罗，而是称为卡达图·室利佛逝（Kadatuan Sriwijaya）或者瓦努阿·室利佛逝（Vanua Sriwijaya）。^③曼陀罗这个词虽然也曾出现在铭文中，

^① Victor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800-18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33.

^② Craig Reynolds, A New Look at Old Southeast Asi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4, No. 2, 1995, pp. 427.

^③ A. O. Zakharov, Constructing the polity of Sriwijaya in the 7th–8th Centuries: The view according to the inscriptions, 2009, Indonesian Studies Working Paper, No.9, pp.2-3.

但用来指代室利佛逝的各个省份，而不是中心或整个王国。^①

就一些史学观点来看，曼陀罗理论也并非无懈可击。沃尔特斯强调印度的政治文化尤其是印度的《政治论》的影响，他举例说到东南亚各王朝重视王国的七个要素无疑是受到考底利耶理论的影响。实际上，对七个要素的重视并非考底利耶的著作所独有，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摩奴法典》，考底利耶的信徒卡曼达卡(Kamandaka)的《尼蒂萨拉》(The Nitisara)、著名的政治寓言《五卷书》、佛教的典籍等都有类似的描述。在东南亚地区，婆罗门的影响力往往集中在王室的上层，王室依靠由婆罗门构成的祭司阶级所拥有的专业知识。从这一点出发，婆罗门们更感兴趣的是推广《摩奴法典》而不是《政事论》的教诲。^②东南亚的统治者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印度的政治文化，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其次，沃尔特斯创造了“有能力的人”这一术语，这暗示了这些有能力的人可能都是男性。根据东南亚的历史，女性发挥的作用也是相当突出，不少女性先后成为国王。那么，又该如何看待女性在曼陀罗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呢？值得注意的是，沃尔特斯后来又明确提出要考虑女性的价值，^③但更深入的研究还是留给了以后的学者。

格尔茨提出尼加拉这一概念后不久，保罗·惠特利(Paul Wheatley)出版《尼加拉与指挥官》一书，运用尼加拉概念探讨东南亚早期城市国家的起源和发展。^④对这一概念的争论同样十分激烈。有学者批评他过分重视印度文化的影响，而忽略了同为南岛语系的塔希提岛、萨摩亚岛和夏威夷波利尼西亚王国等国家的相似之处。^⑤还有学者对尼加拉模型的非历史性和静态性提出疑问，认为格尔茨过分强调文化而忽视了其物质基础，使政治制度非政治化。^⑥格尔茨书中出现的将国家权力仪式化，忽视了权力的物质基础，更是成为被批评的焦点。在当时的巴厘乃至整个东南亚大陆出现的暴乱、王室叛乱以及战争不可胜数，剧场国家却给这些不间断的暴力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在格尔茨之后，一些新出版的关于东南亚古代王国的论著则不断强调回归传统，重视王国内部的权力斗争和争斗的政治经济基础。考德威尔质疑尼加拉模型的潜在政治本体论，他根据对南苏拉威西卢武(Luwu)王国的研究指出，与其说卢武是一个神秘的、只顾眼前利益的政体，对真正的权力无动于衷，倒不如说它

① Stephen Druce, *The Decentralized Austronesian Polity: Of Mandalas, Negaras, Galactics, and the South Sulawesi Kingdoms*, *Suvannabhumi: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9 No. 2, 2017, pp.7-34.

② Susan M. Walcott, *Mapping from a Different Direction: Mandala as Sacred Spatial Visualization*, *Journal of Cultural Geography*, Vol.23, No.2, 2006, pp.71-88.

③ O. W. Wolters, "Some Further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in O. W. Wolters eds., *History, Culture, and Region in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55-175.

④ Paul Wheatley, *Negara and Commande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3.

⑤ Graeme MacRae, "Negara Ubud: The Theatre-state in Twenty-first-century Bali",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Vol.16, No.4, 2005, pp.398-403.

⑥ Fredrik Barth, *Balinese Worl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p.222.

是一个充斥着无休止的战争、掠夺和谋杀的王国。^①

另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是，曼陀罗这一术语是否能够解释东南亚历史的全部，换句话说，是不是东南亚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存在着这样一种曼陀罗关系结构。一些研究表明，东南亚高地的曼陀罗政治并不明显。例如，利奇描述了缅甸北部山地克钦人的政治结构，是基于贡萨与贡劳之间相互转换的振荡模式。^②看起来曼陀罗更像是描述东南亚低地地区的政治概念。

越南和菲律宾在使用曼陀罗概念上也会有些麻烦。越南的南部比较容易辨认，早期的占人王国一直是东南亚曼陀罗体系的一部分，在内政和外交上基本保留了一种本质上属于东南亚的方式。越南北部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中国的统治之下，独立之后也被视为一个政体上模仿中国的中央集权官僚国家，与东南亚其他地区松散整合的印度化国家形成鲜明对比。

沃尔特斯等学者早期倾向于将越南北部排除在曼陀罗体系之外，^③但最近的研究表明，越南北部国家在处理与占婆、老挝、柬埔寨的历史关系时同样深受曼陀罗外交规则的制约。瑞德强调东南亚根本的社会文化性质是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的根本原因，这些社会文化特质包括灵魂的观念、女性的地位及作用以及债务确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等。^④从这个角度出发，越南多次偏离中国的文化轨道，是东南亚社会文化整体性的一部分。一些著名的越南史专家如基思·泰勒（Keith Taylor）、约翰·惠特莫尔（John Whitmore）等人，则从越南的王权继承传统、女性在王权中的作用、王权与佛教的关系以及越南与东南亚区域国家的关系等方面出发，指出越南北部同样受到曼陀罗关系的影响。^⑤因此，将越南视为一个特殊的曼陀罗国家，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

菲律宾似乎也是一个例外。早期的历史学家如霍尔等人在论述东南亚地区文化的整体性时，往往将菲律宾排除在外^⑥。在殖民时代之前，作为一种主要的政治单元，菲律宾的村庄由村长管理，村长的地位和权威几乎完全由当地决定，与来自上方或更高的权威来源没有联系，就像曼陀罗体系中的神王一样单独行事。这些村庄在被

① Ian Caldwell, "The Myth of the Exemplary Centre: Shelly Errington's Meaning and Power in a Southeast Asian Realm",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22, No.1, 1991, p.113.

② 埃德蒙·R. 利奇著，杨春宇等译：《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202 页。

③ O·W·沃尔特斯著，王杨红译：《东南亚视野下的历史、文化与区域：区域内部关系中的历史范式》，《南洋资料译丛》，2011 年第 1 期，第 57—58 页。

④ 安东尼·瑞德著，吴小安、孙来臣译：《东南亚的贸易时代》（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13 页。

⑤ John Whitmore, Elephants can actually Swim: Contemporary Chinese Views of Late Dai Viet, in David G. Marr, Anthony Crothers Milner, eds, *Southeast Asia in the 9th to 14th Centuries*,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6, pp.11-133; Craig J. Reynolds, A New Look at Old Southeast Asi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4, Iss.2, 1995, pp.419-446.

⑥ 霍尔著，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东南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 1968 年版，第 19—20 页。

纳入殖民地之前是政治上自治的单位，这可能也是曼陀罗概念在解释菲律宾历史发展时遇到的主要障碍。

尽管如此，将菲律宾孤立于曼陀罗体系之外并不明智。沃尔特斯认为，吕宋岛海岸的民都洛岛最早在 10 世纪下半叶就已开始形成较大的地区曼陀罗，之后受到伊斯兰文化影响，菲律宾南部苏禄和棉兰老地区开始扩展曼陀罗模式。^①一些对苏禄群岛政治研究的著作也肯定菲律宾地区存在曼陀罗政治体系。^②

（二）研究范式的进一步发展

在最新的研究中，东南亚史的学者们继续发展曼陀罗的研究。在 21 世纪，一些学者仍然运用曼陀罗的概念，解释东南亚的历史发展。例如，利伯曼依据太阳系政体在东南亚的历史发展，追溯了东南亚大陆地区曼陀罗政治的发展轨迹。他将东南亚的历史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分别是宪章管理、分散式的印度化管理、集权式的印度化管理以及中国式官僚管理四类，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存在一种主要的管理模式。^③另外，一些关注东南亚历史的国际关系学者也加入其中，罗西塔·德利奥斯、阿查亚^④、亨德里克·斯普鲁伊特^⑤等人则大大拓展了曼陀罗理论在东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运用。

另外一些学者则对传统的曼陀罗史学范式提出更多质疑并进行扬弃。传统的曼陀罗中心边缘结构仍然受到了激烈的批评。至少有三种新的研究范式，同时对曼陀罗的一些概念发起挑战。第一种是高地——低地（upland-lowland）范式。这一范式承认东南亚的低地地区是王朝统治的曼陀罗中心，但是在高地，低地王朝的权力和影响力有限。高地对低地的影响始终存在一种反抗。格雷夫高研究了泰国西北部高地的佛教古迹范围，他将一系列废弃的佛塔作为公元 1200 年至公元 1650 年间与低地中心的社会政治互动的重要指标，认为高地墓葬的特征反映了低地群体的参与程度。^⑥他发现，高地对低地的依赖有一定的规律，在靠近低地中心的高地地区，墓葬多呈现出佛教的纪念性墓葬特征，而在更偏远的高地地区，非佛教纪念性墓葬的规

① O·W·沃尔特斯著，王杨红译：《东南亚视野下的历史、文化与区域：区域内部关系中的历史范式》，《南洋资料译丛》，2011 年第 1 期，第 52 页。

② Mark Williams, Mandala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Magindanao Muslim Society, *The Culture Mandala*, Vol.7, No. 2, 2007, pp.1-11.

③ Victor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800-18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35.

④ Amitav Acharya, *The Making of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 Reg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⑤ Hendrik Spruyt, *The World Imagined: collective beliefs and political order in the Sinocentric, Islamic and South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socie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⑥ Peter Grave, Beyond the Mandala: Buddhist Landscapes and Upland-Lowland Interaction in North-West Thailand, AD1200-1650, *World Archaeology*, Vol. 27, No. 2, 1995, p.243.

模和范围越来越大，形成了一种抵抗景观。^①当然，对这一抵抗景观的研究更为深入的，恐怕要数斯科特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中所描述的佐米亚地区，处于佐米亚的高地人不惜主动逃入山地并采用高地人独有的政治社会体系来防止低地曼陀罗王朝的控制和骚扰。^②

第二种范式是“上下游模式”（upstream-downstream paradigm）。同高地低地模式相类似，这一模式主要围绕河流的上下游形成河谷曼陀罗中心与上游森林高地中心的互动关系。布朗森最早建立了上下游交换的理论模型，^③这一模型已经在东南亚多国历史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占婆、马来半岛、苏门答腊、苏拉威西的历史发展，甚至15世纪缅甸勃固与阿瓦王朝的关系都可以用上下游关系来解释。^④

第三种范式我们姑且命名为“反转中心模式”。图克认为，传统的以低地王国为中心的曼陀罗研究偏离了社会制定的空间规范，这些空间规范传达并指出个人和群体之间的等级地位，无论是主导还是非主导的。^⑤他通过对阿卡民族（Akha）的研究发现，与人们所期望的将自己描绘成边缘的少数群体成员相反，阿卡感觉自己处于宇宙中心，周边的中国人、缅甸人和掸族都被当作外围居民。^⑥空间的神圣与世俗也在村庄内外转换，村庄内部被视为受到神灵保护的圣洁的安全之所，但村门之外是森林的领域，充满野性的、邪恶的灵魂，以及危险的低地人。阿卡人通过这种空间转换的实践，使得低地的曼陀罗中心变成了一个贬值的、消极的、危险的边缘。^⑦阿卡人的观念与实践对低地的曼陀罗中心绝对是一个挑战，在消解低地中心权威的同时，也将自己视为新的曼陀罗中心，因此这是一种文化和心理上的“反转中心”实践。

四、反思与总结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东南亚史的曼陀罗研究路径存在以下

① Ibid., p.258.

② 詹姆斯·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

③ B. Bronson, Exchange at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Ends: Notes toward a Functional Model of the Coastal State in Southeast Asia, in Karl Hutterer, et al., eds., *Economic Exchan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Southeast Asia: Perspective from Prehistory, History, and Ethnograph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7, p.39.

④ 相关的论文参见：Michael Aung-Thwin, A Tale of Two Kingdoms: Ava and Pegu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42, No.1 (February 2011), pp. 1-16; J Kathirithamby-Wells, Hulu-Hilir Unity and Conflict: Malay Statecraft in East Sumatra before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Archipel: études interdisciplinaires sur le monde insulindien Archipel*, Vol.45, No.1, 1993, pp.77-96.

⑤ Deborah Tooker, Putting the Mandala in its Place: A Practice-based Approach to the Spatialization of Power on the Southeast Asian 'Periphery'-The Case of the Akh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5, No.2, 1996, pp.323-324.

⑥ Ibid. p.352.

⑦ Deborah Tooker, *Space and the Produc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 among the Akha Prior to Globalization: Channeling the Flow of Life*,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215-237.

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重视史学概念的创新以及争论。东南亚史学界先后提出星系政体、曼陀罗、尼加拉、太阳系政体、分段国家、佐米亚等概念，每一个概念的提出都会带动相关研究和争论，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推动新概念提出和理论创新，这是一个循环不断的进步过程。第二，跳出东南亚之外，重视从其他区域研究中汲取知识，并且反哺东南亚本土的区域研究。诸如分段国家的概念最早来自于对人类学者对非洲政治体系的研究，后来应用到世界上其他地区包括东南亚地区的研究；而星系政体、曼陀罗、尼加拉、佐米亚等概念，已经越出东南亚区域研究的范畴，成为非洲、拉丁美洲、中东等地区研究的热门词汇。概念与术语的跨区域流动为理论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洞见。

以此反观国内的东南亚史研究。2010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乐顿分校的历史系教授孙来臣提醒中国学者反省并警觉国内东南亚史研究中多年存在的几种思维定势。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东南亚史研究长期存在的闭门造车局面。^①必须肯定，中国东南亚史研究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进入21世纪以来，一大批国外东南亚研究名著，诸如《东南亚的贸易时代》、《农民道义经济学》（2013年再版）、《比较的幽灵》、《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尼加拉》（2018年再版）、《逃避统治的艺术》、《图绘暹罗》等兼具思想与理论高度的东南亚史著作先后译作中文，而一些名著虽未出版，例如利伯曼的《形似神异》（*Strange Parallels*）等书，但已经在着手翻译。中国学术界也有部分学者尝试借鉴东南亚史最新成果，例如贺圣达先生的《东南亚历史重大问题研究》、张红云的《东南亚神王文化》等著作，显现出国内学术界努力摆脱闭门造车局面的研究动向。与此同时，中国的东南亚史研究也开始注重相关概念的理论探讨。受到葛兆光等学者提倡的从周边看中国的影响，不少研究论文都重新探讨了东南亚与中国朝贡关系的实质，强调双方的观念冲突以及东南亚各国对朝贡关系的实用主义观点，开始摆脱过去一味坚持的中国与东南亚朝贡关系的提法。中文期刊已经刊登了一些运用曼陀罗概念解释东南亚历史及现实的文章，也显示出中国学术界进一步与国际接轨的努力。

但是，中国的东南亚史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典型的问题：大量的东南亚史研究倾向于以汉文典籍为基础，依托中文资料进行研究。中国的明清历史档案中保留的大量涉及东南亚各国的研究资料以及华侨华人资料，仍然为中国学者所偏爱。相应地，中国东南亚史研究的两大主攻方向分别是基于传统汉文献的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以及华侨华人史研究。自西方殖民者进入东南亚以来，形成了一大批以官方贸易档案、一手的游记或笔记等为主的西方史料，记载了东南亚当地的政治社会与国际关系等方面，具有很高的研究和参考价值。中国在这方面引入的并不太多。在国际学术界，除了汉文献是东南亚史研究的必备材料外，外国学者们在运用西方和东南

^① 孙来臣：《中国东南亚研究述评》，《南洋问题研究》，2010年第4期，第92—102页。

亚本土史料方面远远超越中国学者。

东南亚本土一手史料的匮乏不可避免地造成很多问题。近些年来，西方学者相继整理和翻译了东南亚的一些本土史料，包括编年史、战争史等。例如有关泰国的《清迈编年史》^①（Chiang Mai Chronicle）、《难府编年史》^②（Nan Chronicle）、《清康编年史》^③（Chronicles of Chiang Khaeng）、《阿瑜陀耶皇家编年史》^④（The Royal Chronicles of Ayutthaya）、丹隆亲王编撰的《我们与缅甸的战争编年史》^⑤（The Chronicle of Our Wars with the Burmese）和缅甸的《景栋编年史》^⑥（Padaeng Chronicle and the Jengtung State Chronicle）等数十种著作，这些著作先后被翻译成英文，极大地推动了英文学术界的东南亚地方史和区域史研究。也正是基于这些新的史料，曼陀罗理论才具备了扎实的史料基础。中国学术界近些年来的翻译仅有《马来纪年》（再译）、《琉璃宫史》、《爪哇史颂》等寥寥几本东南亚本土历史文献，与国外学术界的差距不可谓不大。

因此，未来中国的东南亚史研究要想迎头赶上，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第一，着手将东南亚本土的经典史学文献翻译成中文，这种难度可能较大，从英译本着手也不失为一个较好的策略。另外，除了汉文典籍，一些西方经典研究文献、阿拉伯文献以及东南亚本土的马来文、印尼文等早期的历史文献都需要加大翻译力度。在此基础上，东南亚区域史的研究才能够进一步发展起来。第二，进一步加强史学概念与理论在东南亚史研究中的运用。对曼陀罗史学范式的回顾表明，借助理论的争论和概念运用，西方的东南亚史研究取得长足的进步。中国的东南亚史研究需要广泛借鉴各个地区史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同时扩大相关史料的运用广度和深度，才能将我国东南亚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责任编辑：郑佳]

① David Wyatt and Aroonrut Wichienkeo, eds., *The Chiang Mai Chronicle*, Silkworm Books, 1998.

② David Wyatt, ed., *The Nan Chronicle*, Cornell University, 1994.

③ Volker Gradowsky and Renoo Wichasin, *Chronicles of Chiang Khaeng: A Tai Lu Principality of the Upper Mekong*,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8.

④ David Wyatt, ed., *The Royal Chronicles of Ayutthaya*, trans., by Richard Cushman, *The Siam Society under Royal Patronage*, 2000.

⑤ Price Damrong Rajanubab, *The Chronicle of Our Wars with the Burmese*, trans., by Phra PHraison Salarak et al., White Lotus, 2001.

⑥ Sao Saimong Mangrai, *The Padaeng Chronicle and the Jengtung State Chronicl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2.